

# 《讲话》的边界和核心

袁盛勇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个重要的历史文本,它在当代中国被阐释的频率无疑是很高的一个,文本迄今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讲话》而不会混淆和湮没于历史与现实,也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亚文化现象。纪念《讲话》似乎成了当代中国文化建构的一部分,当然,这样一种当代文化往往是真伪参半的,而倘若把“纪念”仅仅理解为一种仪式,那么这样一种仪式还是具有几分真诚的,这种历史和文化感,促使我在研读和思考《讲话》以及它与延安文学乃至现代中国文学的关联时,往往不能不意识到《讲话》的边界和核心。在我看来,对这个边界和核心问题的理解,其实是理解《讲话》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一个重要环节,或者更大些说,是一把理解现代中国文学之历史走向和文化内涵的钥匙。

有如任何一个历史文本,《讲话》也存在一个话语边界问题。只要你认为文本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属性,那么文本就存在一个边界问题,文本的有效性是在它的边界之内发生的,真理往前哪怕多走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信然。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乃是因为它有其特定的时空范围,也就是边界,超越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历史对现实和未来的越位或犯界,就有可能演变成灾难。文化也是如此。一种文化经

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由于它因应和凝练了所处时代的需求,而能超越时空发生异样的生命的,乃在于它内在具有一些关乎生命、自然、宇宙的永恒性话题。但经典不能代替今天和明天的创造,经典还是有它生存的边界。譬如我目前栖息其间的这座城市,原本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无疑正在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可文化创造的激情,却在近年被不恰当地引导到了对于某类经典的复制之中,这是对于经典的误读和滥用,人们忘却的恰恰就是历史和经典的边界。由于研究的需要,我看过不少关乎《讲话》和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论著,其中一些颇能给我以思想的启迪,感谢这些思想者,但也有一些所谓老左派、新左派和受福柯等后现代文化思想影响甚深的研究者的思考,我实在是不敢恭维的,他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正在于忘却了历史和理论的边界,忘却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的存在,而自以为掌握了历史、文学和文化的真理。那么,《讲话》的边界到底在哪,是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认为,《讲话》在现代中国的意义,首先不是理论思想上的,而是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上的,这是准确理解其历史和当代价值的前提,也即我所言的边界。

《讲话》的产生过程非常复杂,偶然与必然在此

总是纠结在一起。说它偶然,乃是因为它的产生的最初促动,就是由于那么几个延安文人和几篇作品引发的。一个重要的文人就是鲁迅的弟子萧军。萧军在延安时期曾经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关爱,但是他跟周扬等人的矛盾又是那样不可调和,而当萧军等人的自由批评权利受到周扬等人的压抑时,他就在毛泽东面前提出了中共中央有无文艺政策、应该制定文艺政策的话题。毛泽东坦率地说,整天忙着打仗,哪有什么文艺政策,但是他对文艺政策的制定当即表现了极大兴趣,进而挽留萧军等人为他收集正反两方面的材料。周扬曾经提到延安作家有“鲁艺”和“文抗”两派,前者主张歌颂,后者主张暴露。丁玲对此做过严厉反驳和否定,其实否定并不符合历史实情,延安文人中的派性和矛盾是自然存在的,萧军和周扬的矛盾就是一个显明的例子,当然丁玲不是周扬所言文抗派的首领。再者,文艺座谈会之前,丁玲、王实味等人集中发表的《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一系列批评尖锐的杂文,还有那些讽刺性的漫画和吸引人们目光的“轻骑队”之类的墙报,尽管初衷都是为了帮助延安整风广泛而深入地展开,也并非有违延安整风的旨意,但其在延安高级干部中所引发的不良反响,也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忧虑。这些并不令人愉快的文化现象的发生,对毛泽东有关文艺政策的关注和思考,应该说或多或少都有些触动,也有些偶然的吧。《讲话》的产生有其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有其不可移易的历史逻辑性,它在毛泽东的政治文化建构和意识形态权威的形塑上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讲话》之前,其实延安并非没有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延安当时的文化政策还是非常契合文化创造的自由天性的,但是这个文化和文艺政策更多打上了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张闻天的思想烙印,在毛泽东看来是有些自由主义的,是跟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不太一致的,因而它的有在本质上就是无。理解《讲话》的产生,这也是个大的思想和历史背景。

思想逻辑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历史的逻辑走向,历史本来可能是无逻辑可言的,但因为人尤其是强势话语者的介入,也就具有可供理解的几分逻辑了。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延安整风运动为何会向延安文艺、文化和延安文人方面延伸。历史是需要用宽容之心去加以理解的,因为历史是非常复杂的存在,而对复杂之真的打捞,往往需要一

种淡定、悠闲和包容的胸怀,在历史研究中泄私愤或充当愤青至多只是一种杂文家的心态,这是求得历史真相的大忌。《讲话》乃是一个关乎政治文化和文艺政策的文本,而不是仅仅基于毛泽东个人艺术和文化天性的理论思想文本。《讲话》的产生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意识形态语境,它的价值首先体现在政策方面而不是理论方面,毛泽东倡导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主要不是对于文艺问题的理论研究感兴趣,他要解决的是对文艺政策的引导和制定。因此,把《讲话》首先理解为一个带有超越时空的文艺理论文本,正是当时和后来不少宣传者、研究者或许别有用心或许无所用心的偏执,是一厢情愿,更是对《讲话》边界的越位和误读。

不仅《讲话》的产生是基于重新制定党的文艺政策的考量,它的发表和传播最初也是作为一个党的文艺乃至文化政策来定位的。文艺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存在,这对于深谙古典诗词创作的毛泽东来说,乃是不言自明的,所以,他对《讲话》的发表不能说非常慎重。1943年10月19日,为着纪念鲁迅逝世七周年,毛泽东才安排胡乔木协助整理“讲话”记录稿,并根据新的情况做了一些修订和增删,同意全文在《解放日报》发表。但是,有个背景其实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就是国民党在1943年9月召开的五届一中全会上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主张以国家与民族至上的民族文化建设为旨归,并以此压制共产党对于文艺乃至文化运动的领导。所以,《讲话》发表的时间选择,不仅仅是为了纪念鲁迅,更是为了反击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正面确立共产党的文化政策。《讲话》发表后,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43年11月7日发布了《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其中首先明确指出:《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sup>〔1〕</sup>显然,中共中央最初是把《讲话》当做一个总的文艺政策来加以宣传和阐释的。《讲话》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左翼文化界,也是首先把它当做一个党的文艺和文化政策来传播的。这也可以说明,《讲话》的政策性是其写作和发表的最初动机和边界所在,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和思想史意义是在政策宣传中逐渐形成的,尤其是在周扬编写《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后,《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

一项重要成果,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只有理解了《讲话》的政策属性,也即它的外在的边界和历史的边界,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进入它的文本世界,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理解它的核心之所在。《讲话》是被纪念得最多的政策性文本之一,政策的时效性决定了这样一种纪念的特殊意义,倘若它有其恒定价值的话,也当在理论和思想的层面去加以理解。关于这,讲得最多的是《讲话》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因为毛泽东在《讲话》“结论”部分的引言中,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对之做了简要阐述。他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或这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与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个问题为中心加以说明,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sup>(2)</sup>也有人认为《讲话》的核心,就在“结论”所述的第一个问题,即“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又说:“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毛泽东就此提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兵的,这也就是曾经谈论和宣传得最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人们以为这个命题的提出才是《讲话》的核心之所在。上述说法,无论是“为群众”还是“为着工农兵”,在《讲话》中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上述问题的讨论,其实就是围绕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来展开的。但是,当人们在津津乐道这个命题的时候,就经常忘记了它的话语主体性问题,即:工农兵和群众到底是谁的工农兵和群众?换言之,在何种意义上,工农兵和群众才是有价值和有组织的一个群体?也忘记了现代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某些历史教训,赵树理、周立波和丁玲等作家,在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时,为何一个时期受到意识形态部门的欢迎,而在另一个阶段就会受到无情批斗。所以,认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是《讲话》论述的着力点和核心,是无法准确回答上述有关理论和历史问题的。那么,《讲话》的核心到底在哪,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我想首先指出,《讲话》的核心命题和思想逻辑就在“党的文学”本身<sup>(3)</sup>。先来看一个历史细节。萧军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做过自由发言,直言道:政

治、军事、文艺尽管有其相通的地方,但辈分是平等的,独立的,谁也不能领导谁。作为一个革命文艺家,就要像鲁迅先生当年在广州一样,保持一种较为自由、独立的状态,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胡乔木坐在萧军身旁,当即站起来反驳道:“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迅当年没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结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听了胡的发言,毛泽东非常高兴,会后让他跟自己一块吃饭,说是祝贺开展了斗争,取得了胜利。”<sup>(4)</sup>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看重胡的发言,乃是因为涉及了一个党的文艺或党的文学问题,涉及了一个“党的文学”如何实现的问题,而这些正是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所着力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其实就是《讲话》的纲,也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纲,是建构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所在。

“党的文学”本是左翼文化人对列宁文化观念带有一定转换性质的译介,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的一份重要遗产。为了帮助延安知识分子和作家理解这个观念的重要性,博古曾在《解放日报》上重新译介发表了这篇文章,并且在所写按语中高度肯定了“党的文学”观念在新的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博古对“党的文学”观的译介和强调,显然承继了瞿秋白等人的做法。毛泽东在《讲话》“引言”部分,首先明确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在“结论”部分,更是肯定了“党的文学”观念,并且以之作为自己论述的主要关节点。他说:“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党的文学”观念所内含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文学应该从属或服务于党的政治,后者变化了,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否则就会发生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错误。依此观念就可理解,同样是赵树理等作家,同样是写所谓工农兵文学,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为何前期大受欢迎,后期就步履维艰并饱受批评了。

党的文学观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要确立和坚定党的立场或无产阶级立场。在毛泽东的思想架构中,阶级立场和民族立场具有一致性,因而党的立场不仅代表了无产阶级立场,也代表了民族的立场。于是,“党的文学”原则不仅适用于党的文学本身,而

且也似乎在逻辑上适用于民族国家文学的发展。但这里分明包含了一个党的立场所处的优先性问题。毛泽东不是不需要文人和知识分子,而是需要无产阶级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但当时以延安为中心的中共政治区域所大量拥有的并非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需要一个思想改造,需要进行文艺整风。其实,如何引导作家和文化人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转变为无产阶级立场,正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之一,也是《讲话》强调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它能否得到合理解决,乃是一个关系到“党的文学”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毛泽东在《讲话》“引言”部分,曾以自身经历对之予以阐述。他说:“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早先厌恶劳动,看不起工人农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后来,革命了,在战斗中同工人农民和革命的战士在一起了,逐渐熟悉他们,并在熟悉中感觉了他们的伟大。就在这时,我的感情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变了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干净处,就是身体也不干净,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大小资产阶级都干净。”据此,毛泽东富有逻辑地提出了思想改造的命题:“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毛泽东在5月28日的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报告了文艺座谈会情形,指出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使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革命干部乃至共产党相结合的问题,而这“中间就要解决思想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要破除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才能够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才能够有马列主义的党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内外两方面着手,引导知识分子和作家来一个自觉的思想破坏,而其主要途径,就是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深入开展整风学习和思想改造。如果不进行思想改造,毛泽东在《讲话》中认为这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话语说得很重,而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毛泽东语气平和一些,他说:“如果不使知识分子和作家把资产阶

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来一个自觉的破坏,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那末就会成为这些同志在行动中完全同工农兵和党相结合的一个障碍……所以在整顿三风中间,一切同志都要整顿,文艺界也包括在内,其目的就是要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sup>(5)</sup>。这就讲得很清楚了:一方面,无产阶级立场、党性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安身立命之本,舍此,就不能与工农兵、干部相结合,不能跟党的政治保持一致,即不能跟党相结合;另一方面,要想达到这个思想统一的境地,必须对知识分子和作家加强思想改造和整顿。改造的目的,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还是在于如何使其跟党的政治相结合,如何跟党的政策在言行上保持一致,并最终创作出既能宣传党的意识形态,又能吸引工农兵阅读和观赏兴趣,并最终一并在改造工农兵思想的同时也改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党的文学”的问题。理解了这点,所谓文艺创作的源和流、歌颂与暴露、普及和提高、文艺与政治、阶级爱和人类爱,以及工农兵方向等命题,其实也就成了由党的文学观念和思想改造实践而生发的枝节性与技术性问题,或工具性和次要性命题,而非《讲话》的核心命题。在党的文学观中,创作主体主要不是基于个性主义的了,而是集体主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整风之后,创作者在基本意义上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党的文艺工作者或党员作家。当时陈云在座谈会期间,曾找刘白羽和丁玲谈过一次话,提出对于共产党作家而言,首先是共产党员,然后才是作家,不但组织上要入党,思想上更要入党。1943年,他又明确指出,应该反对“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倾向,而应确立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文化人的观点,因为“文化工作只是党内的分工”,没有什么高人一等之处。<sup>(6)</sup>应该说,陈云抓住了党的文学观念的要点,他的理解跟毛泽东文艺思想保持了高度一致。倘若把文艺创作者都改造成了党员作家,那么“党的文学”和未来新中国的文学何愁不会走向繁荣。

《讲话》不仅成了党在文艺领域的最高政策性文件,成了当时及后来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还成了共和国文学创作的最高准则。其实,毛泽东曾对《讲话》有着较为清醒的认知。《讲话》发表后,他曾对胡乔木说,郭沫若和茅盾发表意见了。其中,郭说“凡事有经有权”,这是说《讲

话》里有着经常的道理和权宜之计,毛泽东听了很欣赏,觉得遇到了知音。<sup>(7)</sup>对于《讲话》,毛泽东在后来把它收入“毛选”时,又做了一些修改。显然,《讲话》的理论思想内涵,毛泽东还是很有些心知肚明的,是意识到了它的政策边界和理论边界的。这个边界,也就是它的限度。但是,人们在后来愈来愈忘记了它的边界的存在。而且更为可悲的是,人们对少数能够提醒《讲话》边界性存在的文艺理论家和知识分子给予了致命的批判和压制,胡风的命运即是如此。其实,胡风对其文艺观念的坚守就是一种善意而执著的提醒,《讲话》有其不可逾越的边界。关于《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胡乔木在新时期曾做过深刻反思。他说,“文学服从于政治这种话是不通的。古往今来的文学都服从于政治,哪有这回事?恐怕绝大多数的作家根本不承认这样的事。”又讲:“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楚了。”<sup>(8)</sup>应该说,胡乔木的反思有效拆解了这个长期禁锢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观念,值得肯定。但是,他在反思时也似乎有些忘记了毛泽东《讲话》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的话语背景和思想逻辑。须知,在这个背景和逻辑内,毛泽东《讲话》所蕴涵的文艺必然从属于党的政治这个胡乔木理解的“权”,恰好是不可更替的“经”,而且只有在这个列宁主义的文化观念中,“党的文学”和文化观念才能够自圆其说。关于“党的文学”,胡乔木也曾指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属于讲话本身的问题。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讲了一个齿轮和螺丝钉的比喻。当时《解放日报》登的这篇文章,是博古翻译的。LITERATURE,很容易译成文学,但LITERATURE的意义很多,我反复看原文,认为不能译成文学。齿轮和螺丝钉不是指文学,是很明显的。”接着又说:“因为将列宁的文章中的话翻译错了,影响到认为文学是齿轮和螺丝钉,作家也是齿轮和螺丝钉”,故而“毛主席不能对翻译负责”。<sup>(9)</sup>这个辩解和说明,倒是从一个《讲话》

整理者的角度提醒人们对于“党的文学”的关注,而这也正是《讲话》的核心及其内在边界之所在。

总之,《讲话》有其历史的边界和文化的边界。党的文学观作为《讲话》的理论和思想核心,在其边界之内,在一个民主的场域里,其实站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有其合理性,也取得了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但是,倘若逾越了它的政策边界和理论边界,执意用同一标准来要求每一个作家,执意用它来规约并替代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学,一个远为复杂得多的基于人性和想象的文学,那么,因这逾越而带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就会促使文学乃至文化的发展终究背离文学与文化自由发展的本来。难道不是吗!

[本文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课题“延安文艺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编号11&ZD11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载《解放日报》1943年11月8日。

(2)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载《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本文引述的《讲话》均见此版本。

(3)关于“党的文学”,请详见拙作《“党的文学”后期延安文学观念的核心》,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4)参阅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笔者按:胡乔木的回忆显然不够充分,时间上也有误记。当时萧军跟他发生争议的时间是在5月23日座谈会闭幕这天,是关于鲁迅前后期是“发展”还是“转变”的问题。萧军认为鲁迅思想前后一贯,是“发展”;而胡乔木认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鲁迅思想在后期发生了性质上的“转变”(参阅萧军:《萧军全集》第18卷第2册,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第631-633页)。但无论胡乔木有关鲁迅转变还是党对文艺的领导,都为毛泽东所欢迎,倒是事实。

(5)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26页。

(6)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

(7)(8)参阅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0页,第58-59页。

(9)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8-59页。另请参阅胡乔木:《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几点意见》,《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2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